



源於奧運

踏上奧運征途

就在明天，香港電視奧運製作團隊就要踏上征途，進軍現時在世衛標準下仍被稱為「疫區」的日本東京了！這幾天東京新冠疫情感染率，就好像老人在奧運開幕前跟大會開玩笑一般，由本來每天幾百人感染上升至接近千人，疫情不斷加劇，令準備前往的運動員及工作人員既興奮卻又很擔憂，興奮在於終於可以參與這延期一年的難得國際盛事，擔憂在於能否「有穿冇爛」地回家。

其實，日本已經是世界上數一數二的一個先進、乾淨、清潔、安全、醫療也很發達的國家，奈何在今次疫情之下也無可避免地深陷新冠病毒的泥沼，只期望未來的日子能夠把疫情控制，不要再為奧運添加變數了。

今次在疫情下進入日本比起以往的準備可謂繁複了好幾倍，因此這幾天筆者都忙得不可開交，忙着出發前要準備的事情：前往東京者除了必須擁有日本奧委會發出的奧運工作證外，更需交上72小時內共2次的深喉唾液檢測，並得到醫院簽發日文 COVID-19 合格證書才可以上機；若已完成疫苗接種，則還需要透過驗血做血清抗體測試，測試合格後從東京回來香港時便只需進行7天檢疫隔離。經過這幾項程序，希望明天能順利上機，而在飛機上，是一個封閉的室內，如果有帶菌者，是傳播疫情極高危險的地方，唯有希望檢測能有效地防止到

帶菌者上機，而我們在飛機上也應全程保持警覺（幸好香港飛日本不長途），減少不必要的接觸。

如果在機上沒有被傳染，在入境時順利通過檢測，這才算是正式進入日本國境，開始我們轉播東京奧運的工作。當然入境後也不能完全鬆懈，還有每天的工作，必須天天小心，不要中招。今次前往東京進行奧運轉播工作，比起以往多了一份「上戰場」的感覺，好像打仗一樣，而我們這團「戰士」必須要戰勝疫情。

今屆東京奧運，是歷史上第一次延期的奧運會，過往從沒有任何一屆奧運會因為戰爭以外的原因而取消或者延期，用「百年一遇」也不足以形容，差不多是近「千年一遇」了，相信沒有人會預計到這情況發生，相信這將會成為一個學術研究的案例。過往我曾參與過9屆奧運電視轉播製作，累積了不少經驗，近幾次也可以靠着經驗從容地面對這份工作，但今次第10次參與，則大部分事情也是第一次發生，包括香港政府購買奧運轉播版權、五間電視台首度合作、疫症、封關、入境、檢疫、限制觀眾、限制採訪……即使是我也猶如一個新人般面對，難免緊張。

姑勿論未來面對什麼環境，明天香港電視製作團隊也如期出發，兵來將擋，水來土掩，團隊會盡能力去報道這次東京奧運香港運動員表現，為香港觀眾可以安全在家參與奧運而努力！



方寸不亂

恐襲陰霾

已經多天沒有到擾攘的銅鑼灣，只去灣仔走一轉，還是碰上了恐襲陰霾。這天到灣仔某集團的大樓取份文件，下樓就被保安員截流繞道到後門的出口，大堂出口圍封了，面向街道的攝錄相機一字排開，傳媒嚴陣以待。在這裏的上班族，都習慣了一些熱鬧情況，大樓集團老闆是娛樂名人，常有明星進出，經常是傳媒焦點，攝錄陣陣場面見怪不怪，大家都以為老闖又冇大驚。

回家看電視新聞，才得悉剛才的陣勢，與全城關注的「光城者」炸彈案有關，炸彈案其中一名「金主」，就是大集團的職員。在大樓的打工仔說，有機會曾與「炸彈案」疑犯擦身而過，危險人物就在身邊而不自知。

灣仔不遠，就是香港的商業地標銅鑼灣，崇光百貨的門外，十多天前發生了可怕的「刺警案」，血的氣息被人氣沖淡了，但刀光血影仍歷歷在目。恐襲既是那麼遠，又是那麼近。以前看到其他國家恐襲死傷無數，為他們的不幸感嘆，那是遙遠的國度，香港從來都是安全城市，居安不曾思危。誰會想到，恐襲悄悄來到了身邊？誰會願意看到，我們生活的地方，陷於恐襲的陰霾之中？

不可思議的是，竟然有人為仇恨歌功頌德，也有教授為恐襲開脫罪名，更有傳媒把恐襲本末倒置。有傳媒問保安局局長：「是否市民沒有訴求渠道，才有如此暴力的事情發生？」鄧炳強局長直斥其非：「這是本末倒置的說法，是否警察不捉賊，賊人就不會犯案？」

犯案者慣於本末倒置，「違法達義」、「恐襲有理」，欲以歪理行天下，把香港推向深淵。香港市民真要醒醒定定了，縱使對政府施政不滿，也不要被鼓吹「恐襲有理」者誤導和綑綁，更要對恐襲說不。



翠袖乾坤

書正何須大

二手書局裏，大批6×8寸面積的舊書，很多都出版自世紀六十至八十年代上海中華大光等書局；內文也差不多全是細號排字印刷，一百多頁到二三百頁左右，拿在手中翻閱時，那種手感也真十分舒服，尤以不超過150頁者為然。相信事前一定是經過出版商集體詳細研究設計出來的共識。

類似版本，今日「社會富裕」之後的新書就不多見了，就是不少舊版書目再版翻印之後，也多變了面目，面積多已擴大至8×10寸，好處是內頁已非容易磨滅的新聞紙（這是舊版書令人惋惜的最大缺點），新版本多用書紙或粉紙，電腦打出來的字體也大了一二號，看着無疑較為醒目。

但是面積大，內頁也多了空白，正因面目堂皇，過去一百多頁同一內容的話，也可能增加到三四百頁，重量也可能由舊版三兩半增加到大半磅。

大得適當還好，可是其中有些大書，明眼人看出來，不過是作者抱着「著作等身」的虛榮感，刻意有心營造「等身」的假象罷了。諸如某作者5本散文集，細

讀之下，才發覺全部內容不過只分散來自其中3本：E中有AB，B中有BC，C中有AD……至於不止5本者就更「壯觀」，混雜到WXYZ也不出奇，除了滿足藏書癖的責書人裝飾他的藏書壁，對真正讀書人來說，白白花錢事小，浪費精神和藏書空間就不老實了。至於這類混雜本出自原作者或出版商本意則是題外話。

話說回頭，百多頁軟皮封面舊版書那種充實感，其實就算放舊了也有它原始的書香，簡單樸實甚至連設計笨拙的封面也可愛，既可平放桌面展讀，亦可床上捲讀，硬皮硬頁的洋裝本要是內容不夠分量，儘管設計得如何一流精美，放在豪華書櫃裏，大不了就只宜跟雪茄七彩肥皂盒爭鬥鬥麗。



當年莎翁劇集，不同書局爭相出版。作者供圖



百家廊

袁星

房子不夠住了，得買新房。這個問題愈來愈突出。熙順出生後，母親從老家來到鎮上，她要幫忙照顧兩個孩子。家裏添了兩人，長期住在一起，感覺院落一下子小了許多，總覺得「站沒地方坐沒窩」。

這處院落已經住了整十年，其間修葺過，只是人多了，空間就顯得有些小了。買新房面臨兩個問題。先是在哪裏買？去縣城還是在鎮上。

院落到單位直線距離頂多100米，繞點路也不足200米。離鎮中心小學更近，走出小巷左拐20米就到學校大門。這處位置，算得鎮中心，去學校、單位、超市、政府、銀行等都很近，步行就可以。特別是去單位和小學，步行也就兩三分鐘。若去縣城買房，單趟30餘公里，加上雨雪天路滑、堵車等，一天起碼得在路上耗掉一個半小時。早出晚歸，會十分不便。縣城的樓盤，恰好在學校附近的閒置房源並不多，房價還動輒過百萬。手頭的錢勉強夠首付。兩男孩得養得學，再背上沉重房貸，日子會過得非常緊巴。在鎮上買房，像這處院落所在地，根本就沒有。任何一處在售樓盤，都遠離單位和學校，最近的也得兩三里地開外。頻繁往返在國道上，頻頻過紅綠燈，極不方便。鎮上的房價，相較別處，也不便宜，稍好些的，毛坯房大多在五六十萬元。再一裝修，就得七八十萬元。

選了位置，又得考慮資金。在鎮上全款買房，手頭還差十幾萬元。我跟開發商商量，房款分兩次給，先欠他十萬元，半年內付清。開發商不同意，我只好找親朋借錢。農村老家那邊，借錢這種事常有。父母那代人，借錢不算啥。但出面借錢，我總覺得張不開口。長這麼大，正兒八經找人借錢，我還是頭一次。實在沒轍，不抓緊，房子就被別人買走了。說到爭搶房源，我對中介是頗為不滿的。中介為了謀求更多利潤，想方設法抬高房價。製造競爭也是其售賣手段之一。你看上這套房了不錯，看上這套房的還有幾家人，誰出價高誰付款早就給誰，真真假假的，想買的人家不敢賭，萬一真被人家買去了呢？



書聲蘭語

不容青史盡成灰

7月7日，由香港樹仁大學歷史學系、香港公共管治學會、香港浸會大學當代中國研究、國史教育中心、城市智庫、《亞洲週刊》聯合主辦了「香港保釣50年研討會」——不容青史盡成灰。

保釣運動不覺已經50年了，時間過得飛快，我仍然記得當年我在家裏吃着早餐，突然聽到外面好像一堆吵架的聲浪，我趕緊衝到門口，從中華商場信段的走廊看出去，一幫大哥哥從衡陽路方向走過來，個個高舉拳頭，一邊大聲叫喊着，走向中山堂方向，他們叫喊着什麼，我聽不清楚？忙問二姐這是幹什麼？她說：「保衛釣魚台！」

這是我對釣魚台的第一印象，第二次的印象是，台灣宜蘭蘇澳的漁民憤怒的聲音鋪天蓋地，投訴美國單方面將釣魚台列嶼送給了日本，我疑惑地問，台灣人（本省人）不是一向崇日嗎？為什麼要向日本發出怒吼？原來，世世代代的台灣省宜蘭縣漁民，出海捕魚到釣魚台歇歇腳；釣魚台列嶼附近有黑潮暖流，帶來豐富的魚獲；浙江省、福建省的漁民也前來捕魚。浪濤拍岸，山海相映，嚴格來說，它不算是個島，只是個台而已，本來就是宜蘭縣的外島，怎會變成日本的外島呢？無論從歷史、地理上來看，釣魚台都屬於中國的，我們打開地圖清楚可見，釣魚台距離台灣東北角最近，約190公里，距日本沖繩島420公里；美國人憑什麼把釣魚台送給日本？美國可以決定世界的格局嗎？難道美國對待他國只有強權，沒有公理嗎？

於是1971年在紐約發生風起雲湧的保釣運動，初以中國台灣留學生為主，繼而香港

留學生加入。《亞洲週刊》的總編輯邱立本，今年已是72歲了，但他說起保釣運動，仍然滿腔熱血，義憤填膺，好像回到22歲的年紀。記得他說過：「1972年日本特使椎名悅三郎訪台灣，我和馬英九等保釣戰友在松山機場抗議示威，我衝破憲兵的保護網，一拳打到他的座車，後來被推開。我的拳頭腫脹成豬頭……這是一段青春憤怒的往事。」

50年來，不斷有海峽兩岸暨香港的愛國熱血分子（包括老、中、青年）到釣魚台宣示主權。縱然日本在2012年已經明目張膽地把釣魚台列嶼視為日本國土，但我們永不放棄爭回中國的固有領土！近十年來，中國海警船已常態化巡航該海域。橫臥在東太平洋的釣魚台列嶼大小小總共有11個，那原是我們美麗的海洋國土；清朝國家地圖《乾隆內府輿圖》（1756-1767年製）已清楚標明；記得鄧小平曾說過：「釣魚島主權留給下一代解決！」

台灣人稱釣魚台，大陸人稱釣魚島，而在香港，釣魚島、釣魚台都有人說；名詞、稱呼可能大同小異，但一顆愛國護土的心是一致的，海峽兩岸暨香港都是中華兒女，我們義不容辭，責無旁貸，承繼保釣精神，筆者認為，保釣精神也是辛亥精神！



●樹仁大學歷史系舉辦與歷史有關的座談會類別繁多，區志堅教授不遺餘力。作者供圖

買房紀事

借錢，絕非易事。父母那代人，經常有人家借錢，也經常被借錢。有時借得多，有時借得少，有時借不到，都屬正常。我覺得，一旦開口了，不管出於何種原因，借不到都會很難堪。首先，去開口借錢就是個很難為情的事。我跟村裏的一個鐵哥們說了借錢的事，他爽快答應了，在我家喝酒時承諾借我5萬元。妹妹家做生意，這個季節正好是水果成熟期，一下子在冷庫裏存了2萬多箱山楂，一箱三四十斤，一斤兩三元錢，手頭的錢用完，還有欠款和借款，我不好意思去開口。小叔的女兒家有些存款，我思慮再三，平時少有接觸，最終也沒張口。母親倒是回了老家一趟，問了幾家。沒有不借的，只是個多少問題。

在村裏生活的，多是五六十歲以上的人。他們有點兒錢就存起來，比對利息後，多選擇存款期限3至5年那種，都是定期存款。離開開發商付房款還有一個星期，我又逐個打了遍電話。有的把錢轉到我的微信上，有的送錢到我家。我事先打印好了借條，但都不肯接。多是以「這點錢，還弄借條，太外氣了」這句話推脫不要。有的是真不要，嫌我外氣，大步流星走了；有的在推讓時讓我拉住，把借條硬塞進他們兜兒。

借條，只是一個證據。證明我借了他們的錢。這個借條，其實是有作用的。比如我借錢賴賬不還時，可依法索要。但真正肯借錢給我的，不會在乎這點，他們覺得信任遠比借條管用。不信任的人，他們是不會借的。這一點，我心裏清楚，他們也清楚。但至少是一個借款憑證，不管他們要不要，我必須得給。

四姨家的二哥，最近手頭沒多少錢，他的錢，都借給親戚朋友了。母親問他時，二哥告訴母親手裏真沒幾個錢，最多能借1萬5千塊。母親知道他手頭錢不多，表示理解。那天回老家，我叫他到家裏吃晚飯。天已傍黑，二哥剛從山上摘山楂回來，到我家時說已經吃過飯了，不肯再上桌。喝了幾杯茶後，他掏出2萬元，稱別嫌少，手頭確實沒錢。鐵哥們不識字，家中的存款都是媳婦管着。他告訴我，存款中多數都是定期的，有兩張快到期的，也得2個月後。一張5萬的，定期利息近7,000元，執意取出的話，

利息就打水漂了。但見我急着用，他想辦法以他的名義悄悄幫我湊了3萬塊。

妹妹跟我妹妹說，她聽說我要買房了，我卻沒跟她說一聲。原本沒好意思，她都這麼說了，我就跟她打了個招呼。妹妹告訴我，錢雖不多，但早就準備好了，就等我一句話呢！其實，她把2萬元錢送到我家時我才獲知，那2萬塊錢也是定期的，還差不到4個月到期，3,000多元利息泡湯了。關於銀行存款利率，這些日子我刻意關注過，活期利率和定期利率的差距巨大，因存款人單方面原因定期改活期的，只能拿到很少的利息。

以前同一個科室的小張，結婚時她老公用房貸買的房。小張告訴我，由於沒有住房公積金，利率比較高。40萬房貸，30年還清，每月定期還款2,006元。細算一下，30年下來，連本帶息高達722,160元。利息竟有32萬多元。假如25歲結婚，還款30年，還完房貸就得55歲了。這期間，按一般情況數，至少得經歷懷孕、生孩子、孩子上學，甚至孩子找工作、購房、結婚等。如果夫妻兩人都上班，每個月扣除2,006元房貸，再去掉人情世事各種花銷，再想着給將來積攢點錢，壓力可想而知。當然了，不同地區的房價不同，家庭收入不同、消費水平也會大不同，但購房，終究是個大的開支。

當我決定在鎮上買房時，有些同事勸我到縣城買。她們的意思，我家在鎮上已有一處房子了，再買一套沒啥意義。去縣城買房，雖然貴些，可以先交首付再用房貸，每月2,000多元完全可以應付。每月還款2,000多元，還款30年，沒多大的意外的話，確實行得通。只是這樣一來，每月的收入就大打折扣了，生活壓力也會隨之增大。

習近平總書記說過：「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這話確實對。目前，房價也趨穩了些，但趨穩前一兩年的急速攀升，已經大大提升了小城的房價。四五十萬的房子，短短四五年間就高達八九十萬了。其增長之快，遠遠高於其他方面。

不升不降，一直穩中有升，或波浪式穩中有升，幅度可大可小，或是未來房價之大趨勢吧！若能降下來，當然更好！只是，有種種因素束縛着，想再降到三四年前的水平，怕只能是做做夢了！估計。



獨家風景

兩種勳章

經歷了2019年的「修例風波」和2020年的新冠疫情威脅，在香港國安法的護駕下，今年的香港回歸紀念日「七·一」多了一份祥和，時值中共慶祝百年建黨活動，市面上更多了一份紅彤彤的色彩。疫情尚在，人們未能盡情狂歡，但平靜和安寧相信是市民當下最渴望的。

與此同時，中共中央首次授予的「七一勳章」頗受人關注。在這份29人的授勳名單中，有最年輕的已故鄉村幹部黃文秀（30歲）和最年長（101歲）的兩院院士陸元九；既對年僅33歲的衛國烈士陳紅軍追加勳章，也授予以歌曲激發人心的91歲高齡作曲家呂驥；既有長期深入基層、幫助孤寡老殘如來自安徽的李宏塔，也有80歲高齡仍堅持帶着心臟起搏器在海拔4,500米以上的高原開展科研工作的工程專家吳天一和百歲醫生兼全國勞動模範辛育齡等等，當中包括5位少數民族人士和3位已故者。可以說，事跡很全面，也很具代表性。

閱讀得獎者的簡介及有關生平事跡，他們都是在社會最需要的時刻，走在或留在最前線工作的人，對國家、對社會、對事業的付出和貢獻都是實實在在，有血有淚的，像黑龍江出生的張桂梅年喪母、中年喪夫，自己也患過重病，卻在

病癒後於雲南麗江創辦內地第一所免費女子高中，協助貧困山區超過1,800多名女孩走進大學；而壯族女青年黃文秀在北京師範大學取得法學碩士學位，本來可以在大城市找到一份安穩的工作，卻志願到貧困的村莊負責扶貧工作，在一次山洪暴發中因公殉職，時年30歲……這些獲獎者都是經歷了多年的付出，顯然不只是「打好這份工」，而是懷有對生命、對家園的熱愛和珍惜，更有捨小我、成就大事業的精神，並貫徹始終，令人感動。

回頭看看我們特區政府的授勳名單，雖然名字都是「響噹噹」，我不能說那些位高權重的商賈名人對社會沒有貢獻，但比較起來，當中不少的事跡真的蒼白很多，在普通市民看來，甚至覺得離地，別說感動了。更對在任高級公務員和官員的嘉許，更令人莫名其妙。畢竟，受薪打工和傑出貢獻，應該有所區別吧？

雖然香港的授勳制度有其傳統，但時代在變，政府的思維是否也應該隨之調整呢？香港社會不之感動的人心的好人事，官方的視野是否可以擴大一些？多看看平凡人物的特殊貢獻？

兩種勳章，兩份名單，看出兩套獎賞思維。政府當然要關注政經大事，但在官商以外，還有各行各業的人民。



琴台客聚

伍杲泉

作為一個以寫字為生的「碼字農」，我家的後院已經在我筆下出現過無數次，後院種植的花花草草、瓜果蔬菜都早已為我的讀者所熟悉，而前院卻總是被我寥寥數筆就帶過了。其實，若要嚴格地比較起來，前院種植的花草的美麗是要比後院更勝一籌的。

在中國文人的心底，大抵對於自己的住宅都是有一點小情結的，那就是蘇東坡說過的「寧可食無肉，不可居無竹」。本杲雖然算不上真正的人，因素食的緣故已「食無肉」，但一樣地有着「不可居無竹」的情結。在搬到新家之後，就把前院大門側面窗下的花壇裏開發商原本種好的一些植物移走，栽下了一叢竹子。

竹子是網購的，因為價格頗高，便只買了小苗，栽下後澆水施肥除草，一樣不落地精心照顧。大半年過去，竹子亦未辜負我的辛勞，很快地褪去枯葉，發出新芽，到了初夏時節，便有了

「冉冉偏凝粉，瀟瀟漸引風」的味道。雖然竹子仍舊未長多大，仍舊只是「扶疏多透日，寥落成叢」，但仍舊是令我滿心的歡喜，愈加地多花心思去照料，就連掉了一片葉子也要心疼和惋惜半天。

因為喜歡那叢竹子，竹子和它周邊的每一點細小的變化都會很容易地看到。一次澆水的時候忽地發現幾株竹子中間有兩個大大的腳印，本來已很密集的竹叢被兩邊分開，似乎有人想跨過花壇爬進花壇後的陽台。因為生性懶懶，便未報警，也未找物業處理，只在那之後裝了電子監控。後來遇到前來抄水錶的抄錶員建議我不要在那裏種竹子，這才知道自家的水錶裝在那叢竹子後面，抄錶員要走進才能抄錶。於是，為了保持我的竹叢的完整，我決定把竹叢後的陽台的防盜柵欄鋸掉，以方便抄錶員從另一面進去抄水錶。由於後來的忙碌和我的拖延症，進去抄錶員再來抄水錶的時候，陽台的防盜柵欄還

未鋸掉。而這一次，我的已經艱難地長高和長綠了的竹子被生生地折斷了兩株扔在一旁，其它的被歪歪扭扭地分在兩邊，竹叢間多了一個大缺口，成了一條通向水錶的暢通無阻的小路。

這一來真是「佛都有火」了，對於熱愛植物的人來說，大抵都是寧可別人把自己的錢偷去用，也不願意別人把自己像孩子一樣精心呵護着長大的植物破壞致死的。氣急之下，便打了物業的電話去問他們投訴。後來帶着餘怒收拾倒伏的枝葉和斷掉的竹子，一面收拾，心裏的怒火也一面慢慢地消失了。我在電話裏要求物業主管人員要給我一個交代，然而這個「交代」也就意味着我要為這點瑣碎的小事去和一些人打不必要的交道，要因此花費我所珍惜的無比寶貴的時間。

便想起自己種竹子的初衷，是為蘇東坡說的「無肉令人瘦，無竹令人俗」。斷了的竹子可以再長起來，但若無執於一個「交代」，便是本末倒置，「士俗無可醫」了。